

J I U Z H O U

九州

九州 (第三辑) ○ 荣誉主编 饶宗颐 主编 唐晓峰



商 务 印 书 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九州

(第 三 辑)

先秦历史地理专号

荣誉主编 饶宗颐

主 编 唐晓峰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州.第三辑/唐晓峰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ISBN 7-100-03384-5

I. 九… II. 唐… III. ①历史地理-中国-期刊
②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先秦时代-文集
IV. K928.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54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JIǔ ZHŌU

九 州

(第 三 辑)

先秦历史地理专号

唐晓峰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3384-5/K·722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3/4

定价: 19.00 元

芒
芒
禹蹟畫為九州

己卯饒宗頤題



《九州》编辑委员会

本辑主编 唐晓峰

学术编委 于殿利 李 平 李孝聪 李 零

辛德勇 张 稷 武晓迪 林伟仁

林梅村 赵世瑜 唐晓峰 菅沼云龙

联系地址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100871)

感谢侯仁之学术基金、刘斐玟博士、
菅沼云龙博士、马润潮博士对本书的赞助

目 录

弁 言	饶宗颐	(1)
《禹贡》写成年代与九州来源诸问题探研	刘起钎	(2)
禹画九州考	曲英杰	(14)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述论	胡阿祥	(34)
“云土梦”辨讹	刘起钎	(48)
殷代地理疑义举例		
——古史地域的一些问题和初步诠释	饶宗颐	(52)
殷代历史地理三题	饶宗颐	(66)
卜辞“岳”之地望	唐晓峰	(83)
殷墟卜辞中的亳		
——兼说汤始居亳	罗 琨	(92)
关于成汤都邑位置的历史文献研究	辛德勇	(106)
梁伯戈铭文地理考	张永山	(120)
新见古兵地名考释两则	吴振武	(131)
西周仲山父封樊国考	钱林书	(141)
战国时期赵国疆域变迁考	李晓杰	(147)
关于宋、郑之间“隙地”的性质	陈 伟	(172)
楚都钜阳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徐少华	(180)

先秦货币中的地名·····	黄锡全	(187)
附录 甲骨文著录目及简称·····		(203)

弁 言

饶宗颐

古史年代分期,近年来讨论者多,已成为热门的课题,可是空间方面,则颇受人冷落。我曾经说过考证古代地理有三难(详见《甲骨文通检·地名篇》),我们不能以其难而搁置,因噎废食。考年是“知所先后”的事,考地是“辨方正位”的事,时空交叉关系,正像互联网。为了明了真相,经过不断考索之后,仍有不少问题需要再提出商榷,寻求解决。

本期《九州》,主持人要我担任荣誉主编,还发表我几篇未成熟的作品;有的问题好像已经成为定案,但仔细推敲之后,其中存在许多矛盾,在旧学商量加邃密的原则之下,还是要重新讨论的。

卜辞的研究,已有百年历史,实际仍未达到充分利用的地步。我所提出从本文寻求内证的方法,也许还有可以参考之处。是否有当,望方家加以指正。

千禧年十月

《禹贡》写成年代与九州来源 诸问题探研

刘起钊

《禹贡》是最早的一篇系统地全面地记载我国古代地理的专著。它托用“禹”的名字来名篇,塑造他治理了洪水,奠定了我国疆土,并按自然地理把这块疆土划分为九个州,然后按州记录了其山川、土壤、物产等项,从而根据当时各地农业发展的水平给各州田地分了等级,并据各地总的经济繁荣程度来定各州贡赋的高低,每州之末有一句叙述该州输送贡赋到帝都(冀州)的贡道以作结,这就是《禹贡》以“贡”名篇的用意所在。九州之后又用两章分别总叙了全境的山系和水系。最后一章谈“五服制”,显然是后加的,它是与全篇的自然地理根本不相协的,略有点古史传说背景而大抵出于虚构的有关政治地理的一个空想性规划(例如全境按东西南北各依一定的里数划分政治区域,各距离五百里,三百里,丝毫不差),这种后来增入的不合理的虚构,成为《禹贡》篇的一个赘疣。

这篇被誉为“雄篇大作”(日本内藤虎次郎《禹贡制作时代考》语)的文献,其写成时间历来分歧意见很多;而篇中所谈的“九州”,对中国历史上地区划分的影响很大;而有关其来历,历代经师与注疏家及近代学者中分歧意见亦多。都需要稍加清理一下。

从《禹贡》写成时代及作者等问题来看,汉代出现的《书序》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没有明确说《禹贡》这篇文字是禹作的,但《禹贡》所载别九州、治山川、依土定贡赋诸事则是禹做的。汉末郑玄注云:“禹知所当治水,又知用徒之数,则书于策以告帝。”(“冀州既载”

句下《孔颖达疏》引,《孔颖达疏》以下作《孔疏》)。意谓九州之文为禹书以告帝者。然伪孔但云:“此尧时事,而在《夏书》之首,禹之王以是功。”只说《禹贡》所载为禹之功,故为《夏书》。因是《孔疏》云:“禹分别九州之界,随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复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赋之差,史录其事以为《禹贡》之篇。”是说禹分别九州,治理水害之后,制定贡赋,由史官加以记录而成《禹贡》篇,这遂成为注疏家相承下来的定论。

宋儒提出异说。傅寅《禹贡说断》引张氏(可能张九成)之说,以为只有首尾数句(指“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及“禹锡玄圭,告厥成功”数句)是史官所加之辞,其原有全文为史官所不能知而由禹自己具述治水本末上奏于帝舜之文。那就是《禹贡》全文由大禹原作于虞时,夏史加头尾编定于夏代。此即《禹贡》的作者和写成年代。

到现代,经过学者研究,大都知道《禹贡》不是虞代或夏代的作品,更非大禹所作。学者们递经研究探索,主要提出了下列几种不同意见:

(一)成于西周时期说。王国维《古史新证》中提出运用纸上材料与地下新材料之二重证据法时,简明谈到纸上之史料《尚书》云:“《虞夏书》中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商书》中如《汤誓》,文字稍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下文接着谈《商书》中之《盘庚》等四篇,《周书》中之《牧誓》至《秦誓》20篇,其中分出《康王之诰》故为二十。如并入《顾命》则为《周书》19篇,以为‘皆当时所作也’))”。是王氏明确以《禹贡》必为西周初年所作。至辛树帜先生《禹贡新解》(以下作《新解》)反复周详论证:“《禹贡》成书时代,应在西周文、武、周公、成、康全盛时代,下至穆王为止。它是当时太史所录。”辛书分三编。第一编:“《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分17小节,要义在从疆域和周初分封历史,从政治与九州的关系、从导九山九水、从五服四至、从任土作贡、从贡道、从治水、从九州得名、从九等定田定赋、从土壤分类、从文字结构、从大一统思想的发生时代等等进行分析,以为皆合于西周情况;并以篇名冠以“禹”的原故是由于周初周人宗禹。第二

编：“《禹贡》制作时代的讨论”。录存与当代名学者 17 人来往讨论《禹贡》时代的函件，反复阐明自己所持《禹贡》成于西周的观点。第三编：“禹贡新解”。对九州土壤与田赋、兖徐扬三州草木与土壤、漆沮、鬲沮、沱潜诸水、用字涵义、平治水土、导九山、黑水弱水与四至、九江三江九河、渭汭洛汭、锡土姓三句、五服等等，都作出新解，以为皆西周事物。另有徐旭生《读山海经札记》则云：“《禹贡》之为书，除梁州贡铁稍露破绽外，如依其文字推测，则不惟春秋可有此作品，即在西周亦无不可能处。”是徐氏以为《禹贡》有可能是西周作品。上面惟王、辛二先生之论为西周说的两家力作。

（二）成于春秋时期说。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的《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以为《尚书》的《尧典》《禹贡》与《易·彖传、文言传》诸篇文字，“皆整丽诸雅”，“皆纯乎孔子之文”。是明以《禹贡》为春秋后期孔子所作。辛树帜先生《新解》引西北大学教授王成祖从地理学角度研究，撰《从比较研究重新估定禹贡形成时代》，亦以为《禹贡》是春秋时代产品，且是周游列国博学多才的孔子所作。《新解》以为日本学者研究《山海经》后提出的《禹贡》成于春秋时的看法，与此说是一致的。即上引徐旭生《读山海经札记》语，亦以为《禹贡》有可能是春秋时作品。

（三）成于战国时期说。江侠庵《先秦经籍考》译载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禹贡制作时代考》一文，就九州、四至、山脉、水脉、贡赋等等进行研究，其结论是：“故在大体上，是从战国至汉初关于地理学一种产物之传说，渐次发展，乃有此种之记事甚明。”然《新解》在阐明《禹贡》是西周全盛时代之作并说“它是当时太史所录”后，即云：“决不是周游列国足迹‘不到秦’的孔子，也不是战国时‘百家争鸣’的学者们所著。”而坚持主张作于战国时最有力者为顾颉刚师，但未说明作者是何人。其说始见于他的《论今文尚书制作时代书》，中间屡见于其著作和讲义中，最后写定于《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禹贡（金文注释）》中。首先论述《禹贡》成于战国时代的理由是，春秋以前对于禹的神话只有治水而无分州，至战国之世七国扩展疆域，于是把这疆域看做天下，《孟子·梁惠王

上》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而后九州说出现。进而论证：“五服制是在西周时代实行过的，到战国而消亡；九州制是由战国开始酝酿的，到汉末而实现（汉武始合《禹贡》和《职方》之说结合当时实际定为十三州，曹操执政才依《禹贡》实定为九州）。……《禹贡》篇里把落后的制度和先进的理想一齐记下，……在这里自己说明了著作时代。”接着提出了成于战国的五个具体证据：（1）导山章里有内方、外方。是由于楚国都于郢（今江陵县北），把今河南叶县的方城山作为屏蔽，其北的嵩山便称为外方山，今湖北钟祥县的章山便称为内方山。西周时楚在河南西南的丹、浙二水间，不可能有内方、外方山名。（2）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在宋鲁间开一条运河沟通泗水和济水，因经过菏泽而称菏水。徐州贡道是“浮于淮泗达于菏”，可知《禹贡》的著作后于夫差开运河时代。（3）扬、越双声，义亦同。扬州即越地。然公元前 512 年吴灭徐才使国境达到淮，前 473 年越灭吴，越境才达到淮。《禹贡》说“淮海惟扬州”。不知前五世纪初期以前越离淮还很远。（4）至春秋时蜀尚和中原隔绝，直到战国时秦于前 316 年灭蜀，而后《禹贡》才得以蜀境为梁州。（5）中国之由铜器时代进于铁器时代，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而梁州贡物有铁和镞（即钢）。其结论说：“可知《禹贡》既不是虞夏时书，也不是公元前四世纪后期秦灭蜀以前的书。”而后学术界同意此说者不少，如史念海《河山集二集·论禹贡的著作年代》即持此说，陈梦家《尚书通论》亦言《禹贡》“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即日本内藤虎次郎之说在当时学术空气下显然多少受此说影响。·

（四）成于秦统一后之说。见顾师《禹贡（全文注释）》简单引述云：“有人说《禹贡》中大一统的思想这般浓重，该是秦始皇统一后的作品，伏生为秦博士所以就传了下来。”而未提明“有人说”是何人所说。然上引内藤虎次郎所谓战国至汉初关于地理学的产物之说，则已指及秦统一之后了。顾师在文中即举秦统一后在东南设立闽中郡、在南方设立南海、桂林、象三郡、在北方设立九原郡，这些新辟疆土，《禹贡》全未说及，因而否定了此说。

(五)其蓝本出于公元前 1000 年(当商代武丁时期)以前,其后迭经加工修订而成今本说。此为现代考古学者邵望平氏之说,见《九州学刊》总 5 期(1987 年 9 月)邵氏《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一文,以为“九州既不是古代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战国时的托古假设,而是公元前 2000 年前后黄河长江流域实际存在的、源远流长、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在其另一《禹贡九州风土考古学丛考》文中(载《九州学刊》第 2 卷第 2 期,1988 年)提出同样的认识:“九州实为黄河长江流域公元前第 3000 年间龙山时期即已形成,后历三代变迁仍继续存在的一种人文地理区系。”这一论断的获得,其前一文指出是根据“迄今所发现的中华史前遗址已 7000 多处,确立了近 30 个考古学文化,以碳 14 断代法测出了数百个史前年代数据,由此大体上建立起中国、主要是黄河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因而认为“龙山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奠基期,龙山文化圈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基地。而这一基地与《禹贡》九州的范围虽不是完全吻合却大体相当”。接着历举《禹贡》九州相当于这种人文地理区系的某一龙山文化圈:冀州相当于陶寺类型的龙山文化,即以华山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与以燕山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会合点形成的高度发达的龙山期文化区(亦即华山与燕山之间的中介地带)。兖州相当于河北省南部山东省西部龙山文化圈。(有人提出河北龙山文化命名,尚未定论)青州、徐州相当于泰山周围、北东至海、南达淮河及皖北一隅、西及鲁西平原东缘的山东龙山文化圈,扬州相当于龙山期文化之一的良渚文化(曾被称为浙江龙山文化),大体上和后来的吴文化东部地区相一致。荆州相当于湖北、湖南及江西西部的长江中游龙山文化分布区。豫州相当于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区。梁州相当于与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些地方类型、二里头文化等有不少类似之处的早期巴蜀文化区。雍州相当于陕西龙山——齐家文化分布区。因而其结论是:“公元前 2000 年前后黄河长江流域古代文化区系的划分与《禹贡》九州的划分基本相符。……《禹贡》成书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文字的出现,一是王权的存在。《禹贡》只可能是三代时期的作品。”并以为“《禹贡》作者的

地理知识仅限于公元前 1000 年前的‘中国’，而不是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公元前 280 年的七国疆域。”最后论定：“不管《禹贡》最终成书于哪朝哪代，‘九州’部分是有三代史实为依据的。此外，《禹贡》所载九州贡品，如扬州的瑶、琨，淮夷的玼珠及鱼，荆州的大龟之类以及诸如兖州之降丘宅土、扬州的岛夷织贝等风土人情亦可从考古学、民族学上得到印证，证明其可能为三代的记录”（这些内容详见邵氏《禹贡九州风土考古学丛考》文中）。最后，要提及《禹贡》成书的年代问题。《禹贡》作者以冀州为九州之首，条条贡道通冀州，冀州无贡品，其土壤列为第五等而赋为头二等。这些内容使人不能断然否定九州概念源自夏代的可能。但考古学尚完全不能证其为夏书。商王朝势力所及已达于《禹贡》所述之九州，而九州分野又大体与黄河长江流域由来已久的人文地理区系相合，故不排除《禹贡》九州蓝本出自商朝史官之手或是商朝史官对夏史口碑追记的可能；另一可能则是周初史官对夏、商史迹的追记。再从九州所记的自然条件及物产属于一个较今日温暖的气候期来看，笔者认为《禹贡》中之九州部分的蓝本当出于公元前 1000 年以前。其后必经多次加工、修订才成现今所读到的这个样子。《禹贡》中的‘九州’与‘五服’这两部分内容不相呼应，且大相径庭，倒像是春秋时代被补缀、拼凑而成的。但九州内容之古老、真实，却绝不是后人单凭想象可以杜撰出来的。结合考古发现重新研究九州及其贡品，可能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多重性找到古籍上的证据。”这是从文献以外，就考古学成就所提出的最可珍视的意见。

以上诸说，其专从文献中探索者，以辛树帜先生的西周说和顾颉刚先生的战国说考辨周详，论证绵密，因而在学术上产生了影响。特别是顾先生之说以其学术声望及所举战国诸证中有数证具说服力，因而信从者多，遂成为晚近学术界中有力的一说。其实辛先生之说不可忽视，而顾先生之说其（三）（四）（五）三证是颠扑不破的，但其（一）（二）两证尚可商榷。其（一）证以内方外方二山至战国始有，然春秋前期的僖公四年，《左传》已载楚国方城、汉水之固，则方城、内方、外方在春秋前期

早已有之,不待至战国。其(二)证以吴王夫差开凿菏水,因而《禹贡》必在其后始能载菏水。然《水经·泗水注》载酈道元亲眼验证,知夫差只是把菏水“浚广”了,而非新凿。再核以事实,夫差赶到黄池来与会军事匆匆中,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又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开凿这样长的一条运河的。再从记载此菏水的古代诸文献包括《禹贡》在内,都把菏和淮、泗、济、汶等水一样作为自然河道叙述,故程大昌《禹贡论》考定菏为原有之水,出陶丘菏山,济水过此会菏,正和在其北会汶一样。因此很难说吴王夫差开凿了此河,因而也就不能说《禹贡》写成会在夫差之后。

顾师所举的(三)至(五)三证确为战国地理资料写入了《禹贡》中,这只好理解为古代文籍总不是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而往往经过一个较长的流传过程,由前后不同的人递增而成;有的则是主稿成于前代,在流传中于某小节目中增入了后代一些有关资料。《禹贡》即是如此。而在一个关键性问题上,知《禹贡》必早已存在于春秋周定王以前。即《禹贡》中的大河,自大伾山北折,经大陆泽,再北至今天津北入海,自南向北直贯今河北省境。据《周谱》说周定王五年河徙,始离大陆泽之南向东行,而后形成后代河道。虽焦循《禹贡郑注释》说定王五年无河徙事,杨守敬《禹贡本义》全驳了焦循之说。近人史念海推崇焦循说,谭其骧略同于杨守敬之信其有,进而以为约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齐、赵、魏等各在河两侧筑堤,而后大河走《汉书·地理志》河道。今观《禹贡》所记河道是在此以前的自大伾北折的古大河,根本不知有河徙之事。这是《禹贡》不晚于春秋的铁证,是无法动摇的关于《禹贡》地理的最根本的关键性记载。又一不晚于春秋之事,即《左传·哀九年》载吴王夫差“城邗,沟通江淮”。《孟子·滕文公上》说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这是就当时淮泗已通江的事实说的,误把夫差的功劳记在禹身上了。可知这是战国时人所共知的事实,可是《禹贡》写成时还完全不知道此事。扬州章说“沿于江海,达于淮泗”。传文释为:“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即当时南方要运货到北方,只能沿江入海,再循海道入淮以通北

方。可知《禹贡》中的江、淮不通,是早在春秋后期夫差开邗沟以前的事实。再如“冀州”一词,在春秋资料如《左传》等书中,皆指今山西省境,北及内蒙南部。到战国资料如《山海经》、《逸周书·尝麦》、《晏子春秋》、《楚辞·云中君》等文献中,皆扩展冀州的含义为中土、中国、天下。而《禹贡》所用冀州一名,仍只是其朔义,其州境即春秋时所指的晋境,显然在战国用以指中土、中国、天下以前。这也是不晚于春秋之一要证。还有必早于战国的史实两则:一为《禹贡》各州之土壤,其颜色未按五色分配,于徐州却又独贡五色土,此皆在战国五行说盛行以前。又一为《战国策·魏策一》载苏秦说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而《禹贡》于其地只称荥而不称鸿沟,亦知此在战国以前。由这些即可知《禹贡》本文所反映的至迟为春秋之世所已有的地理情况,流传至战国之世,确增加了一些战国的地理情况。它的全文在流传中确有些增益补充的过程,像最前三句和最后两句,如宋儒所说,是最后才加上去的。也如邵望平氏从考古角度论断,其蓝本出现在前,其后经过加工才成现在所见的样子。

以上所录过去就文献探索所得,《禹贡》写成情况大致如上所述。既早已存在于春秋之世,它必非凭空产生的,那么就应考虑,王国维辛树帜先生的成于西周之说有其合理性了。

现在益以考古学者的意见,就使我们视野扩大,知道古代九州的分,是一种客观存在,有着源远流长的自龙山文化时期已自然形成后历三代继续存在的一种人文地理区系。即是说,公元前 2000 年(约当夏初)前后黄河长江流域古代文化区系的划分,与《禹贡》九州的划分,基本相符。这就使人们体会到,这种文化区系,是九州划分的自然依据。不过如邵氏文中所说的,《禹贡》的成书要有文字的出现和王权的存在两条件。三代是中国古代确立了王权的时期,至于文字,则殷墟卜辞已是成熟了的文字。在其前必经过漫长的岁月缓慢逐步的演进,才能臻于成熟,则夏代之必有原始文字当无可疑,但显然很难写出《禹贡》这样的“雄篇大作”(内藤虎次郎语)。但商代已确能写出长篇文章,《商书》

五篇即其遗迹,像《盘庚》共达 1283 字,比《禹贡》1194 字多。不能因殷虚文体的简朴,怀疑商代是否能有长篇之作,正如不能因周原甲骨之简朴,怀疑周初是否能有长篇一样,而有名的周初八诰固自为长篇杰构。因各自的作用不同,卜辞只需要简短,文诰则自需长篇大作。邵氏提出审慎意见,对于夏代,只是说“不能断然否定九州概念源于夏代的可能,但考古学尚完全不能证其为夏书”。这样说非常严谨。而其所提出的两个可能却具有现实性。即:“不排除《禹贡》九州蓝本出于商朝史官之手,或是商朝史官对夏史口碑追记的可能;另一可能则是周初史官对夏商史迹的追记。”这是非常审慎而又中肯的卓见。其后一可能完全就是辛树帜先生从文献中多年探索所得的看法,其前一可能则比辛先生看法更提前一个朝代。这就能使探析《禹贡》时代只把眼光拘于后代的在文献中兜圈子的研究者猛然惊觉,要有胆量把眼光探向前代了。也更使我们对这位经过深入研究然后提出卓见的考古女学者不能不由衷的敬佩了。我们今天可以赞同其前一可能,《禹贡》蓝本出于商朝史官之手,则《禹贡》定本就是后一可能,是由周初史官所追记的了。这就同于王国维、辛树帜二先生之说了。其微异者,辛先生谓由周太史据西周现实所记,邵氏谓系周史追记夏商所继续的自龙山时期以来的人文地理区系。不过周史据西周现实所记却是符合这一人文地理区系的。因此辛先生之说仍是可取的。

这种人文地理区系不管三代的政治区划如何变迁,其人文地理区系大的框架,始终保持不变,因而能源远流长地传下。《禹贡》既避开各时代的政治地理区划而寻求客观的自然地理以划分九州,纵使当时尚不能很明确知道这种自然地理就是自龙山文化时期已自然形成后历经三代继续存在的一种人文地理区系,因而还不是自觉地描述这一区系,而实际上已存在这一源远流长的人文地理区系,那当然就会客观地据以反映这一区系而写成《禹贡》了。只是这一写成时代,经过学者们辛勤的探索,至目前为止,才得到上述的大略认识。

但我们不要忘记顾先生提出的三个战国证据仍是可信的。则西周